

#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端：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 李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2445)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肇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业化道路的确定,以及随即实施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和保障国家安全,新中国领导人学习苏联经验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鉴于优先发展重工业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又只能依靠国内提供工业化所需资金积累和物资保障,新中国一方面在紧缩消费的同时积极贯彻增产节约的方针,另一方面作出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决策,通过构建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工业化 优先发展重工业 资金积累 计划经济

**[中图分类号]**k27;F129;F09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1005-3980.2024.02.001

**[文章编号]**1005-3980(2024)02-0005-07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是从工业化开始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是从工业化发端的,而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社会主义路径,则很大程度上是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所决定的。在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优先发展重工业是龙头所在,牵一发而动全身。本文拟就此做一思想史的梳理。

## 一、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新中国是在明确了适合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之后,开启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的。

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的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怎么走的问题,在其建国方略中之所以作了先发展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安排,与他们对工业化道路的初始理解有很大关系,当然这也凝聚了当时国人的共识<sup>①</sup>。建国前后刘少奇就曾在多个场合强调了坚持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重要意义,并系统阐明了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后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构想。他说:“第一步发展经济的计划,应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工业以足够的原料和粮食,并为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只有轻工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农民需要的大量工业品,交换农民生产的原料和粮食,并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

收稿日期:2024-03-20

<sup>①</sup> 赵晓雷:《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其发展战略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

资金”，“只有在这一步做得有了成效之后，我们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并发展重工业。”<sup>①</sup>他并认为，与靠剥削人民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这是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准确些说是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当然新民主主义是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刘少奇的这一阐述与中共其他领导人当时的主张总体上并无二致。

但是，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后发展重工业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推进方式，是需要一定的内外部条件相配合的，那就是：在未来的10至15年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建设环境，既没有来自国外的武装干涉，也没有发生国内的武装暴动（来自国内资产阶级的）。否则，一旦发生这两种情况，“我们就要立即过渡，革命的性质就要改变”。<sup>②</sup>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些地方实践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多次出现左右不定的摇摆，而且不时暴露出一种按耐不住的欲大干快上尽快改变落后状态的冲动。种种迹象表明，一旦条件发生变化，或者具备了某些条件，新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是很容易转向赶超型发展模式的，按部就班的发展思路是不得已而为之。

1948年，毛泽东曾提出希望到苏联去和斯大林商量建国有关问题，其中就包括“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包括（特别是）军事、采矿、交通（公路和铁路）运输问题”<sup>③</sup>，可见在毛泽东心里更希望能够争取到苏联的援助先把重工业搞起来，因为这是当时的中国最为急需的。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接管城市后的经济工作是这样安排的：“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sup>④</sup>之所以把国营工业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它主要是依靠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来的重工业，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关系着未来工业化的前途。工业发展次序的这种安排被写进了《共

同纲领》，表明建国时这一愿望同样也是多数人的共识。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争取到3亿美元的优惠贷款，苏联用这笔贷款向中国提供50个大型工程项目，其中重工业占了绝大多数。当然区区3亿美元的外资援助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新中国领导人采取的方针还是更加充分地发挥国内资本的作用，实施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严峻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敌我双方悬殊的军事装备对比，强化了新中国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决心。通过这场战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更加强烈地意识到，有了政治上的独立还不是真正的独立，一个国家要获得真正的独立，必须建立自己强大的工业体系，必须尽快启动并完成自己的工业化过程。而“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十多年中（从1921年开始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sup>⑤</sup>。有鉴于此，“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sup>⑥</sup>。

做出这一明确的改变是从1951年着手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开始的。这一年5月，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华禁运提案，参加禁运的国家由14个巴统成员国扩大到36个，禁运的物资包括武器、弹药、原子能材料、石油以及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等，品种多达1700余种。至此，中国已很难从西方国家得到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设备和原材料。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迫使中国不得不优先发展重工业，以迅速建立维护国家政治独立、军事安全的基础。10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

<sup>①</sup>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28页。

<sup>②</sup>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7—48页。

<sup>③</sup>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河北省党史研究室编著：《苍茫大地主沉浮——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2页。

<sup>④</sup>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8页。

<sup>⑤</sup>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06页。

<sup>⑥</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90页。

此后召开的一届政协三次会议，明确了计划经济建设的中心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建设。该年年底，中共中央对即将展开的工业化建设的战略方针作了如下的概括：“这一计划的重点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sup>①</sup>

工业化建设的思路到1952年加快编制五年计划时更明确了。该年1月16日，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给周恩来写信，强调用不着走弯路摸索，必须完全依靠与信赖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建立最现代化的工厂。今后苏联对中国的最大的、最有效的援助就在这个方面。<sup>②</sup>毛泽东对此信非常重视，特别批示要求中央会议讨论。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向中央和政务院提交了《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及《总说明》，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点是工业，工业建设又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8月，中央决定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就“一五”计划中需要苏联援助的工业项目问题进行商谈，中心环节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车辆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基础化学工业等。<sup>③</sup>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指出：“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集中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特别是地质勘探、设计和施工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同时要求不得忽略轻工业、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sup>④</sup>

进入1953年，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为主导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付诸实施。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

业、机械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

对于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陈云于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有一个详尽的说明。报告指出：“能够使用于五年计划建设的财力有限，如果平均使用，百废俱兴，结果必然一事无成。而且，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大量供应化肥、农业机械、柴油、水利工程设备，就不可能大量修建铁路，供应汽车、飞机、轮船、燃料和各种运输设备。”另外，要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必须扩大轻工业。但现实的情况是，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因就是既缺少来自农业的，也缺少来自重工业的原料。再者，我们还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军队。为此，只有以重工业为重点才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才能摆脱对先进国家的依赖，才能逐步而又尽快地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工业，使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sup>⑤</sup>

## 二、依靠内部解决工业化的资金积累问题

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从哪里来？显然不能寄希望于任何外部渠道，我们没有殖民地，也不可能像西方列强那样靠压榨殖民地获取资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实行封锁政策，所以就更别提“马歇尔计划”式的资金技术援助了；我们唯一可能获得援助的来源只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考虑到我们的体量太大又基础太差，任何外来资金援助与巨量的资金需求来说都是极有限的。这一点建国之初我们就看得很明白。早在1949年12月，周恩来就曾说过：我们当然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帮助。这种真正的帮助，有助于我们自力更生。但是从长远看，“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国外援助为主？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

<sup>①</sup>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75页。

<sup>②</sup> 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2页。

<sup>③</sup>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54—255页。

<sup>④</sup>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49—450页。

<sup>⑤</sup> 《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92—593页。



为主。”<sup>①</sup>到1955年，周恩来就说的更明确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大力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五年计划。建设重工业，必须长期地投入大量的建设资金。这种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是要依靠我国内部积累来取得的。”<sup>②</sup>

那么，我们通过内部积累来解决工业化资金问题的条件又如何呢？陈云在关于“一五”计划的报告中列举了四个方面的资金来源：（1）由于推翻了帝国主义，过去被他们掠夺的资源、财富不再流失，可以用于国家建设；（2）由于推翻了封建主义，农民不必再向地主交纳高额地租，可以把其中一部分拿出来帮助国家建设；（3）由于推翻了官僚资本主义，把他们的财产变成了全民财产，这些财产所产生的利润可以用于国家建设；（4）由于对民族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他们利润中的一部分可以通过缴纳所得税和变为公积金，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国家建设。<sup>③</sup>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工业化的长期资金来源渠道主要还是农业，这是由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1949年是68.4%，1952年是57.7%，直到“一五”计划最后一年的1957年，还占到46.8%。这自然成为中国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抽取对象，这也正是大规模工业化启动伊始就出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的主要原因。统购统销本质上就是为了通过控制流通环节，从税收之外最大限度地攫取农业剩余。对此，陈云说得很明白：“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但是也决不能不照顾农业，把占国民经济将近90%的农业放下来不管，专门去搞工业。”“至于缩小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是由于我们工业品少，也不要以为很快可以做到。这

个问题我有责任说清楚，因为还要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sup>④</sup>推进农业合作化同样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一是认为“合作化是花钱少、收效快的增产办法”，二是认为“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的工作，也要容易得多，合理得多。”<sup>⑤</sup>毛泽东也讲：“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sup>⑥</sup>

1953年毛泽东批评梁漱溟提出要照顾农民利益的“小仁政”思想，指出：“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sup>⑦</sup>总之，实现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金，必须依靠内部挖潜，贯彻增产节约的方针，同时放慢改善生活的速度，“它必须服从生产的发展，它的速度必须低于生产发展的速度。”<sup>⑧</sup>不过，实践中，如何恰当处理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是一篇大文章，在这方面我们有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1954年5月10日，陈云出席一个会议时说：我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长期的过程，我们是突击；资本主义可以去掠夺殖民地，我们要靠自己；资本主义开始是搞轻工业，我们一开始就搞重工业；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而我们说要按比例发展是从长时间算的，在短时间内，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不要脱节太远，实质上并不是按比例的发展。吃穿的供不

<sup>①</sup>《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页。

<sup>②</sup>《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9页。

<sup>③</sup>《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93—594页。

<sup>④</sup>《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7、180、196—197页。

<sup>⑤</sup>《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第224、253页。

<sup>⑥</sup>《毛泽东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32页。

<sup>⑦</sup>逢先知、金冲及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75页。

<sup>⑧</sup>《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12页。

应求，实质上是工农业矛盾的反映。<sup>①</sup>可见，计划经济建设，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通俗地讲，就是要注意把发展生产同改善人民生活恰当地结合起来。这一问题“一五”计划处理得比较好，从“二五”计划开始，就走向积累率严重偏高的趋势上去了。

新中国的工业化资金积累一靠开源，二靠节流，为此必须坚持不懈地贯彻增产节约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的增产节约运动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也给此后的工业化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早在1951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就很有远见地指出：为了准备今后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国家工业化积累大量资金，全国人民也必须加倍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因为我们积累资金的方法，不能采用资本主义国家所用的掠夺殖民地或通过侵略战争取得“赔款”等强盗式的方法，基本上只能依靠人民内部力量。所以应该认识到“增产节约”绝不是为了解决临时困难的措施，而是关系国家建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经常性的政策，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持久的群众性的运动来推动。<sup>②</sup>同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在下发的文件中进一步指出：实行增产节约这一方针，“不是消极的，而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它是既保证朝鲜战争能够胜利又保证国内物价继续稳定的方针，它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它又是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转移社会风气的方针。总而言之，它是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并奠定将来伟大建设基础的方针。”<sup>③</sup>此后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就是与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直接相关的。

进入1953年以后，伴随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企业转化为社会主义企业，改善公有制企业特别

是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被提到更为突出的位置，这当中就包括加强经济核算，贯彻节约制度，这是直接关系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积累的重要措施。当时有学者指出：“节约制度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一切社会主义企业都要不断地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资金的积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企业的内部积累。社会主义企业是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进行的，不受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影响，一般都能有很高的积聚。同时，工人阶级劳动积极性的发挥、技术的不断改进以及经济核算制的推行，不断地提高着社会主义企业的赢利，使企业的内部积累不断地增加起来。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排除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取得资金的方法，而依靠节约制度，由国内积累来实现规模宏大的工业化事业。”<sup>④</sup>

1953年下半年，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中央首先考虑的应对措施就是增产节约，为此专门下发了文件。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把增产节约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和深入下去，使它成为更广大群众的持久的运动。社论强调：“我们的增产节约运动不但是解决目前的问题所必需的，而且也是今后长期建设所必需的。为要实现工业化，为要发展重工业，我们需要有不断增加的大量资金；而为要得到这个资金，我们只能从生产的增加和财政上、生产上的节约来逐渐积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积累的经验，完全证明了这一点。”社论提示：“人人都会懂得，只有在我国人民现时生活已经有所改善的条件下，尽力增产节约，去建设我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才能大规模地发展农业，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工人、农民和全体人民的生活，这是长远的利益所在；只有把我们眼前生活中的局部的利益，服从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长远的利益，这才是全体人民最高的根本的利益。”<sup>⑤</sup>中央的号召得到各条战线的积极响应，增产节约运动有效缓解了大规模

<sup>①</sup>《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81页。

<sup>②</sup>《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人民日报》1951年11月20日。

<sup>③</sup>《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7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8页。

<sup>④</sup>冯和发：《怎样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34页。

<sup>⑤</sup>《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2—415页。

工业化启动初年的国家财政困难，1953年全年实现财政收入222.9亿元，财政总支出220.1亿元，收支平衡，结余2.8亿元。

1954年后，厉行节约持续被作为全国人民普遍的长期的经常的政治任务来强调。1955年底，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他在按语中说：“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sup>①</sup>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sup>②</sup>

### 三、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保障

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依靠国内解决长期的资金积累问题，需要一整套体制作保障，对此毛泽东思考已久。

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过一个“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设想。<sup>③</sup>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对这一设想作了详尽的阐释，指出：所谓“三年准备”，就是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未尽事宜、打赢朝鲜战争和恢复国民经济；所谓“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则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所谓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要采取以下步骤：第一步是实行工业国有化，第二步是农业集体化。换言之，只有经过十年经济建设出现以下经济政治变化以后，才能启动以

上两个步骤：（1）近代工业比重逐渐增大，农业和个体经济缩小；（2）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合作经济）逐渐增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逐渐缩小，作用也缩小；（3）加强了工人阶级、共产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加强了国家的作用。<sup>④</sup>这一思想反映了中央领导层关于何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看法。但是，这里的“增大”和“加强”是个偏自然演化的过程还是一个可以人为加速的过程，阐释得并不明确。事后看来，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中央领导层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个别人的认识前后也不尽一致。要害在于是不是承认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具体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还有一个是否坚持要有个工业化和机械化的前提的问题。1951年山西省委试办农业合作社受到刘少奇和华北局批评，却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表明毛泽东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是要当“促进派”的。

1952年，看到“三年准备”的目标可望如期实现，中共中央酝酿从1953年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启动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而且这时已经明确要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这对于当时人均GDP只有区区119元（54美元）的新中国来说，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必须倾全国之力而为之。在这方面，苏联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成功的榜样，而且恰恰在这个时候新中国争取到了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于是在毛泽东看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成套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在眉睫了。

据《毛泽东传》记载，1952年8月，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试编出来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前往苏联，征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意见。“九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等回国。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等关于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会议就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等进行了讨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

<sup>①</sup>《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91页。

<sup>②</sup>《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9—240页。

<sup>③</sup>《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

<sup>④</sup>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78—182、201—215页。



路线的初步构想，为五年计划的制订确定了根本指导思想。五年计划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轨道，成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sup>①</sup>请注意，毛泽东在周恩来回国当天就主持会议听取汇报，反映出他在此时怀有何等急切的心情！听了汇报他如释重负，如愿以偿，因为新中国在抗美援朝和国民经济恢复中的表现赢得了苏联领导人的尊重，斯大林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毛泽东等的就是这句话，当即在会上提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将“五年计划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轨道”。可见，毛泽东早已胸有成竹，但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才将其抛出来并付诸行动。他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时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sup>②</sup>这样，就把原来设想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大大提前了。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安排，1953年开启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以后，同时也全面展开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目的就是为了将各种经济成分全都纳入计划经济轨道，构建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确保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的顺利推进。薄一波回忆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我们受到苏联那套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很大影响，是顺理成章的，是很难避免的。我们所以发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想以最快速度把全部农业、全部手工业、全部工商业都纳入直接的计划经济轨道。”<sup>③</sup>而且，从当时的实践来看，苏联所示范的也正是一条成功的赶超型发展道路，早在新中国

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强调学习苏联的经济建设经验，指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sup>④</sup>在当时，根据人们的认识，苏联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重要的特征；而要搞计划经济，就一定要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1953年10月，毛泽东明确提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sup>⑤</sup>以上这些，就是新中国1953年同时启动“一化三改”的时代背景。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完成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改造，有计划地开展经济建设，都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要内容，都是服务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的重要步骤。

总之，历史上的各种生产关系都是适应一定生产力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有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就需要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作保障。重工业投资期长，需要的资金量大，新中国基于当时积贫积弱的国情，惟有以苏联为榜样，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将全国的资源集中起来而为之；而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有个前提，那就是要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更何况促成这一过渡的还有苏联援助的历史机遇。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70周年，70年前的客观条件、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结合，共同决定了新中国工业化、进而中国式现代化所要迈出的第一步，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开始就被刻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和固有的本质特征。

[责任编辑 张靓]

<sup>①</sup>《毛泽东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34页。

<sup>②</sup>《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03—604页。

<sup>③</sup>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64页。

<sup>④</sup>《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1页。

<sup>⑤</sup>《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9页。



李文，1963年生，历史学硕士、法学博士，山西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原主任、二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曾主持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以及“马工程”课题研究，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首席研究员。三次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权威期刊，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学术论文逾百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领域有开拓性贡献，主持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刍议》等，率领研究团队成功地构建起了一个全新的学科研究框架，在中国国史学界和社会史学界扛起了一面“国史中的社会史”的大旗。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社会史学会、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常务理事、理事等，曾担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专委会副会长。

长江  
学人